

回念北山翁

刘石

岁近己亥，友人在微信朋友圈中发了一组赏心悦目的贺岁图，我一眼看到其中一张“仁者寿”旁的落款“北山”二字，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昔日登北山楼拜见北山翁的往事。

大约是1992年间，报纸上登出一篇有关施蛰存先生近况的报道，上面提到他有一部辑词集序跋的书稿不得问世。其时我入职中华书局不久，说出于职业的敏感也不错，更多的是缘自对老先生的景仰，提笔给他写信打探稿子近况，询问可否考虑拿给中华书局出。

很快收到复信，说稿子是一位在某出版社工作的老学生所约，但一压好几年，很乐意转交中华书局，并表示马上写信给这位老兄，要他与我联系云云。我正等着那位同行的电话呢，不期施老的第二封信来了，说坏了，本来以经济效益不佳为由一拖再拖，没想到一听说中华书局有意接受，对方马上答应付印，因此只能爽约了。1994年，《词籍序跋萃编》由该社出版。

对施老的景仰由何而生呢？话要从更早说起。1980年入读四川大学中文系，在现代文学的课堂上听老师推崇施老新感觉派小说，于是去图书馆遍寻不得，直到假期回家，在父亲书架上一册内部发行的现代文学作品选里，发现了《石秀》和《将军的头》，读完后的感觉是与此前读过的任何作品都不一样，于是开始关注这位文学史上的人物，知道了他同鲁迅因《庄子》《文选》之争而获讥“洋场恶少”，知道了他因写《才与德》而归类另册，知道了他由创作、翻译转而古典诗词和金石碑帖，触处逢春，成绩骄人。

虽然鲁迅对改造国民性出发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直到今天也让我佩服到听不得人说迅翁半个不字，却从来没觉得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派小说鼻祖的施蛰存，封建遗少的标签能够贴在他的头上！我对这位与鲁迅一样有着硬骨头精神的世纪老人的敬意与日俱增，只是没想过有机会一瞻真容。

机会不期然而然地来了。1992年上半年，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接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匡老高瞻远瞩，既致力于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统筹规划，又认为要站在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高度，从思想、理论和学术上研究传统文化。他规划创刊了一份名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杂志，钱锺书先生亲自审定英文刊名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完美地体现了匡老创办此刊的宗旨。古籍小组以中华书局为办事机构，我以文学编辑室抽调至古籍小组办公室，与从《书品》杂志调来的张世林兄一道专司编辑。

我们外出组稿的第一站就到了上海，王元化、黄裳和施蛰存是必访人物。当年的王元化先生风神潇洒，咳吐如珠，但谈的什么已经淡忘了，倒

是黄裳先生几近一言不发的威仪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尤其是有着转角楼梯和软木地板的来燕斋，使我第一次领略了旧日十里洋场的繁华气息。

印象最深的自然是施老。甫一登上愚园路1018号北山楼逼仄的楼梯，昏暗的光线使人的眼睛一时难以适应。拐了弯抹了角进到屋里，房间虽不算小，光线依然暗淡，屋里几无长物，当中一张小桌子，墙角一张床。靠窗一张书桌，再就是一位出现在面前的文学史上的人物。恍忽间时空都有些倒错似的，我脱口而出一句，“施先生，看见您很高兴啊！”施老的回答记忆犹新：“看见我有什么高兴的？一个快死的老头子。”落座以后我又说，“施老，我父亲向您问好。”“你父亲是谁？”“刘元树。”他应声答道：“刘元树，他不是到安徽去了吗？”

这不禁让我兀自一惊。我父亲刘元树1954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可能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风向吧，他一毕业就希望离开四川，越远越好。离四川最远的地方是哪儿呢，上海，于是就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并被安排给徐中玉先生作助教。到五七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前辈许杰教授被另册，父亲和许多人一样想不通，遂提出辞去担任的教研室团支部书记。加之他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引起风波，被记了个留团察看的处分，转年就离开了上海。

距父亲离开华东师大三十多年过去了，相信这么多多年间父亲与施老没有交往，也不会有人在施老面前提起父亲，甚至由于年龄悬殊，专业不同，他们当年的联系就不会密切，可近年近九旬的老人想都不用想，不仅记得我父亲的名字，还能脱口说出他的去向，这是什么样的脑子啊，不要说四窗洞开，就是八面出锋，也不会让人奇怪！

父亲对几十年前施老的印象也很有意思，他对我回忆，施老应该是晚睡晚起，因为他的课总是排在上午十点。他的收入应该不低，因为教室后面有一个小卖部，上课前他总要在店里买好面包吃。我在徐俊兄编的《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选》中第一次看到施老的书法，那神采焕明的小行书今天任哪一个书法家也比不上。父亲却说早知道他的字好，当年系办秘书发通知到各教研室，施老是古典文学

教研室主任，他总在回执上签一个“知”字，那一个字就让人过目不忘。施老不无得意地对我们说，说来也怪，这段时间不断有人登门拜访，弄得自己好像出土文物一样，甚至美国大学的博士生还有拿他做博士论文题目的，真是莫名其妙。话如此说，心里的高兴掩饰不住。又说到自己的住房，说前段时间有北京来的老朋友来看他，他说看不看不重要，把占我的房子还我才是正事。我才知道他《纪念傅雷》里的话，“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原来是他的夫子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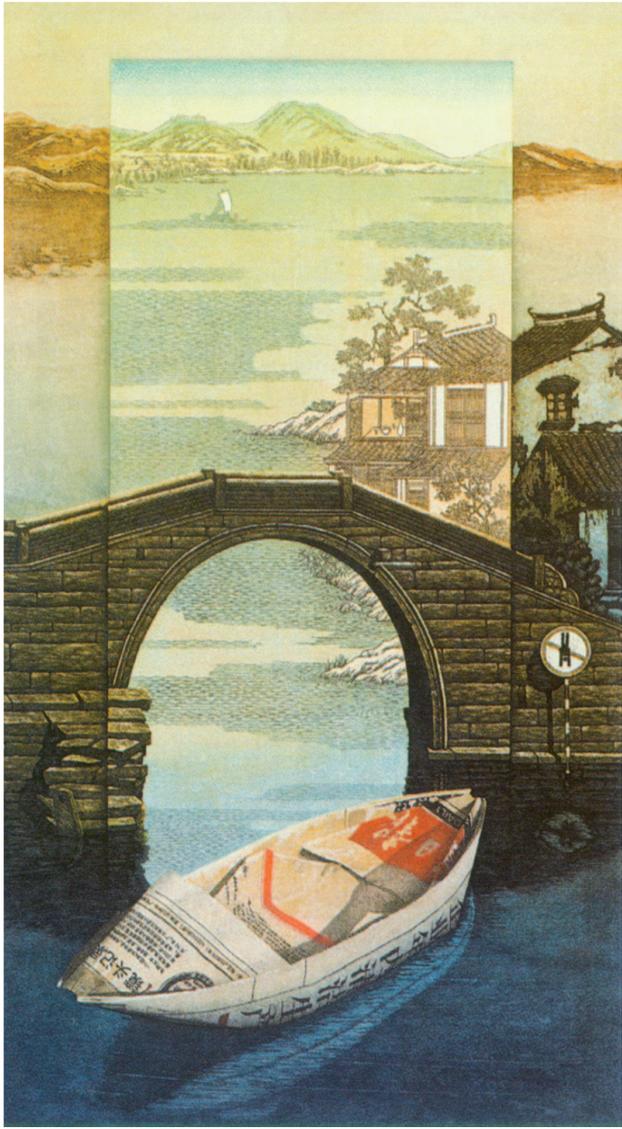
我曾感叹沈从文先生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对付恶劣的环境，不让写小说就去搞研究，一流的小说家涅涅槃了，浴火重生出一位一流学者。但后来看到别人的回忆，沈从文白天登午门给来往的游人讲解文物，晚上回到家中，搂着偷偷来访的年轻人的肩膀痛哭，心不禁为之痛。施老呢，有人说他的长寿之道是蛰伏之道，也就是逆来顺受之道，我的理解则异于是，1957年打成另册，他却从此开始了一发不可收的金石碑帖的搜寻与鉴赏，窗外寒风凛冽的北山楼里春和景明，得要更强大的内心才能做到，这又是对那个荒诞时代多大的讽刺！

顺便说一句，施老去逝后所藏碑帖流出，拍卖行的朋友告诉我，凡铃有“北山楼”、“施舍金石”印的，价高同类数倍。

说实话，我自问算不得追星族，但对施老道德、文章和才性的景仰发自于心，于是从寒斋书架上找出薄薄的一册《金石丛话》随身带上，寻思着视便否请其签名。自来我认为好书当备的条件之一是篇幅小，不仅为容易读完，便于产生成就感，而且我总觉得一个问题哪有那么多的话说呢！蒙施老欣然俯允，坐回临窗书桌前拉开抽屉找钢笔，我一眼瞅见抽屉里推着一本《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以为我也喜爱金石，施老找到同好似的高兴，说今后相关的著作要陆续出版，就委托你作北京的代理啦！可惜不久施老身体转弱，此事未得进展，至今引以为憾。同事王中忱教授见赠，他曾去中国现代文学馆读施老捐赠的日记，其中有某月某日刘石来信谈某事云云，一种黄四娘托体于老杜

诗而传名的荣誉感油然而生。

施老是一个为兴趣而读书的人，他的著述所涉既广，要皆出自心得，可称无新意不文章。篇幅已经够长了，我这里忍不住仍要举《唐诗百话》里的一个例子谈谈自己的感想。“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都知道王勃的这首名诗《杜少府之任蜀州》，所见各本注释无不将首句“城阙辅三秦”中的“城阙”释作长安，独有施老认为，说京城辅佐京畿是讲不通的，如常人那样将“辅”字释为意动，所谓长安以三秦之地为辅，通是通了，但与诗题既无关涉，



船到桥头（版画）顾志军

对朱疆村在天之灵的慰藉。龙榆生的词学研究，“在中国词学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曹辛华语）。在词学文献学、词学史观、词学批评理论，均有独到的认知和发现。所填的词，情景交融，一唱三叹，深得读书人的喜爱。

作为朱疆村与龙榆生的“精神纽带”，“疆村授砚”自然受到学界与文坛的格外青睐。继夏映庵的《上疆村授砚图》以后，著名画家汤涤、徐悲鸿、吴湖帆等人，均于此取材，画《疆村授砚图》。也许画家们觉得“疆村授砚”乃士人之为，古风浓郁，觉得沪上授砚有街衢之浅，风度不足，便把“疆村授砚”的地点搬到山之边、水之畔，有草庐、树石，景深中的朱疆村和龙榆生着长袍，有发髻，彬彬有礼，一副古人的模样。疆村授砚的砚台没有实画，不过，朱、龙之间的空隙之地，分明存在两方砚台。是想象，还是画家的意象，在没有砚台的画面上，我们看到了砚台。这是国画的高妙，这是中国文化的独有。

“疆村授砚”，龙榆生视为拱璧。他经常打开木盒的盖子，看着双砚，思念旧人。两方砚，一方是研制朱墨，用于批注文稿，一方是研制黑墨，用于写作。朱疆村等身的著作，庶几依靠这两方砚台写成。每当看到“疆村授砚”，龙榆生就会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力量。他把“疆村授砚”精心保存了三十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初，他担心“疆村授砚”毁坏或丢失，便交给汤靖先生保管。“疆村授砚”离开龙家不久，龙榆生带着无尽的遗憾辞世，“疆村授砚”也杳无音信。二〇一四年初，汤靖去世，家属与龙榆生的后人联系，将沉寂汤家四十六年的“疆村授砚”完璧归赵，我们也就有了机会一段历史、一个传说，味道苦涩也醇厚。

一段历史、一个传说，味道苦涩也醇厚。

李白的茶诗

郑培凯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很早，文献与考古资料显示，至少在先秦已经流行西南一带，到了秦汉时期沿长江传布到华中华南。但是，真正普遍深入民间生活，是在隋唐时期，特别是盛唐之后，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当时人曾经指出，饮茶普及民间，变成僧俗日用的生活习惯，和佛教寺院清修的仪轨有关，特别与禅宗的坐禅敬茶仪式，把饮茶、信仰、生活、品味、嗜好，连成了一个共生循环的生态模式。

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录》卷六说：“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行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

《封氏闻见录》的作者封演，比李白要晚了一代，与陆羽是同时代的人，此书写于中唐时期，记载唐明皇时期的资料比较翔实。《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论及此书，认为此书与唐代小说多记杂乱荒怪不同，“此书独语必征实”，事必征实，可以作为史料看待，在唐代说部中是极为难得的。《封氏闻见录》讲述了开元时期饮茶习惯的变化，特别指实禅宗的兴盛，影响本来不怎么喝茶的北方人，促成了全国通行饮茶的风俗习惯。灵岩寺，在唐代李吉甫编纂的《十道图》中，与浙江天台的国清寺、江苏南京的栖霞寺和湖北江陵的玉泉寺誉为“域内四绝”，是唐代四大名刹之一。

与灵岩寺并列的玉泉寺，曾是天台宗智顛大师驻锡之处，禅宗北宗神秀和尚的道场，在唐代也和种茶与饮茶有一段因缘，而且是由诗仙李白留下的记录。李白有一首诗《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写了篇序，记载他晚年寓居南京的时候，他的侄子李英（即中孚和尚）从荆州玉泉寺云游到栖霞寺，拿出自己的诗稿，向李白求教。中孚和尚告诉他，玉泉寺附近丛山环抱，有许多乳泉洞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多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醇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庙里的和尚真公，八十多岁了，童颜焕发，就是喝了玉泉茶的缘故。中孚特别带了些好茶给他，“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重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覩。因持之见道，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玉泉茶的外观，是卷曲重叠的，与唐代流行的饼茶不同，是碾晒而成的散茶，因为形状像人手，号称“仙人掌茶”。李白在序中特别交代，要后世知道，仙人掌茶的来历，是始发自他们叔侄两人的。

为此，李白写了《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一诗：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
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
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
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
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

李白诗名遍天下，仙人掌茶经他命题，自然也就流传千古。诗句指出，仙人掌茶是碾晒而成，可以拍拍洪崖仙人的肩膀，也就是让仙人喝得满意，点出了唐代喝茶的多元多样面貌，让我们知道，唐代的缙流雅士饮茶，并非都以茶饼研末，有时也是喝茶的。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抚摸“疆村授砚”

张瑞田

个一寸见方的凹处，如同画家一扫而过的枯笔，神清气爽的。凹处的下面，刻有“疆村先生所授砚”。翻转另一方砚台，也看到一段铭铭：“疆村翁生前以此二砚授其弟子龙忍寒以理遗稿付托既成之尊命其友大庵居士刻志乙亥中秋。”

北京，一个冬天没有雪，立春刚过，稀稀拉拉的雪花在头顶翻卷，昨晚，不大不小的一场雪从天而降。从研究室的一扇窗户，能够看到草坪上的雪，薄薄的一层，很难得了。

朱疆村也是在冬天走的，那是一九三一年的冬天。

十二月二十七日，本是泓社集会的日子，朱疆村病重，未能与会。朱疆村心系泓社，第二天，他口占《鹧鸪天》，请泓社友人教正：“忠孝何曾尽一分，年来妻被减奇温。眼中犀角非耶是，身后牛衣怨亦恩。泡露事，水云身。枉抛心力作词人。可哀惟有人间世，不结他生未了因。”泓社社员们诵读朱疆村的词作，无不怆然泪下，“共语此殆生绝笔矣”。龙榆生“读之，感怆忧惶，遽返村居，达旦不能成寐。次日清晨，遂赋二绝句：（其一）信是人间百可哀，无穷恩怨一时来。只应留取心魂在，穆入丹铅泪几堆。（其二）经句不见病维摩，沾溉徐波我独多。万劫此心长耿耿，可怜传钵意云何。”

三十日，朱疆村在上海寓所辞世，享年七十五岁。我想，一九三一年的

上海冬天，也应该有一场雪。

“经句不见病维摩，沾溉徐波我独多。万劫此心长耿耿，可怜传钵意云何。”心思最重的是龙榆生。朱疆村是在秋天患病的，老人敏感，觉得自己来日无多，未竟之事要托付他人继承。他想到龙榆生。恰好龙榆生来探望，朱疆村精神抖擞了，他拉着龙榆生的手，去一家名为“知味观”的小饭馆吃饭。一老一少，据案对谈，其他顾客觉得好奇，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全然不顾，相谈甚欢，伤感之情，溢于言表。几天之后，朱疆村在病榻上，把自己的硃墨二砚交给龙榆生，嘱咐他把校词之业继续下去。朱疆村授砚，具有象征意义。为此，朱疆村请夏映庵画“授砚图”，记录学人间的趣事。他亲眼看着夏映庵挥笔作画，夏映庵手中的毛笔牵引着朱疆村的目光，直到把《上疆村授砚图》画完，然后，恭恭敬敬地交给朱疆村。几天之后，朱疆村用自己干枯的手提起这幅画，交给了龙榆生。与朱疆村的关系，龙榆生说道：“我因在暨南教词的关系，后来兴趣就渐渐转向词学那一方面去，和疆村先生的关系，也就日见密切起来。疆村先生是清末的词坛领袖，用了三四十年的功夫，校勘了唐宋金元人的词集，至一百八十几家之富，刻成了一部伟大的《疆村丛书》。”

朱疆村早岁工诗，风格近孟郊、